

【沈 阳 历 史 文 化 从 书】



张毓茂 ◎主编

盛 京 遗 珍

温淑萍 王艳春 ◎编著

沈阳出版社

【沈阳历史文化丛书】

张毓茂◎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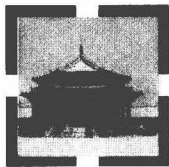
盛京遗珍



温淑萍 王艳春◎编著



沈阳出版社



序

张毓茂

一个城市，同一个民族一样，若忘记自己的历史，忽略自己的文化传统，也就失去创新的根基，缺乏向前发展的精神动力，也可以说，没有了灵魂。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沈阳市，被史家称为“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悠悠两千三百年，沈阳从一个军事哨所，到现代大都市，其发展过程，充满了先祖们奋斗的血汗，卓越的智慧，不屈不挠的毅力，豪迈刚烈的精神品格……这一切，凝聚成以沈阳为代表的关东文化的独特风貌。对这种文化风貌的探究、展现和弘扬，是当代沈阳人承担的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许多有志于此的有识之士，做了大量工作，撰写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书籍和文章。然而，不必讳言，工作还是初步的，还缺乏对沈阳历史文化深入探讨、全面研究和系统总结，因而也就不能适应和满足沈阳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的需要。

于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这部十大卷的《沈阳历史文化丛书》应运而生了！

这部大型丛书，史料丰富翔实，立意新颖精妙，抒写生动流畅。既回顾往昔，更立足当今。从历史纵深的审视中，不仅凸显出沈阳的过去和现在的雄浑博大，也预示着沈阳未来的辉煌。拨开尘封的历史烟雾，丛书为我们展现出金戈铁马的狼烟烽火，筚路蓝缕创业的艰辛，官闾权谋的变幻莫测，市井民俗的千姿百态，名胜古迹的钟灵毓秀，多种文化的融铸和传承，文化精英的高风亮节，以及胼手胝足的劳动大众为创造历史的默默奉献。沈阳的先民在同恶劣自然环境的拼搏中，在同各种邪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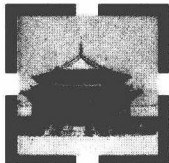
【沈阳历史文化丛书】

盛
京
遗
珍

势力的抗争中，在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中，逐渐形成了沈阳人的乐观开朗、豪爽英武、无所畏惧，既敢于抗争又宽容和睦的宝贵品格。丛书十卷，多角度多侧面全方位把握了沈阳历史文化的血脉和走向。尽管十卷丛书的作者各异，其文风也是姚黄魏紫，各有千秋，但其中的血脉和灵魂却是一以贯之的。正因如此，丛书会给我们当代的沈阳人以启迪，以智慧，以激励，以及坚强的信心和无比的勇气。“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后世的沈阳人应会感激我们今天这份劳绩的。

令人欣慰的是，丛书这项大工程，得到了沈阳市党政领导和各界人士的热情关怀和支持。特别是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对丛书编撰出版尤为重视，将该项目列为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凡此种种，都极大鼓舞了参与此项目的同志们的热情和干劲。一年多以来，辽沈地区的专家、学者和出版工作者，勾沉史料，深入研究，精心撰写。其文稿立足于严肃的辛勤的学术研究成果基础上，但又绝非书斋里的高头讲章，而是深入浅出，鲜活生动，引人入胜。当然，丛书也完全摒弃了目前流行的那种随心所欲的“戏说”历史。如今硕果问世，令人欣喜。十册装帧古朴典雅、文图并茂的图书终于摆在我们面前。我相信，凡是关心沈阳历史文化的人，不论是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市民大众，还是国内外各界人士，都会投入关注的目光，先睹为快。

最后，要提到的是这部丛书的策划者和编辑者李树权和信群同志，两位是出版界成就卓著享有盛名的老编辑。他们编辑出版的书籍，很受广大读者欢迎，而且多次荣获各级奖励。他们现在虽已退休，但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借助紫气东来文化集团公司的支持，完成了这项文化工程，令人钦敬。



目 录

序 张毓茂

001 一代王朝的胜迹,一段历史的
辉煌 武斌

003 迁都沈阳建造皇宫

003 迁都:努尔哈赤的重要决策

005 巍巍大政殿

009 八旗制度与十王亭

山水福陵

015 天柱山巅之福陵

015 宁远之战,大汗殒天

018 大妃无奈从殉

020 天柱隆崇,巍然在望

023 别出心裁的福陵建筑群

035 福陵祔葬的后妃们

大清开国

041 皇太极继承汗位

044 皇太极初展治国大略

050 金銮殿内南面独尊

053 清宁宫里排家宴

056 横扫林丹收遗孀

059 改金为清践帝位

皇宫家事

065 皇宫里的婚姻与家事

065 盛京宫殿的正式命名

068 宫高殿低说凤凰

070 五宫尊崇蒙古女

072 皇子皇女婚与嫁





安眠昭陵

- 079 隆业山之昭陵
- 079 皇太极无疾而终惊朝野
- 083 皇太极安葬昭陵地
- 085 昭陵规模之盛
- 098 昭陵 祔葬的人们
- 101 诸王争位,福临登基
- 107 挥师入关,定鼎中原

重修永陵

- 113 启运山下的永陵
- 120 清初遗物存旧宫
- 125 清帝东巡祭礼

乾隆扩宫

- 131 乾隆与盛京皇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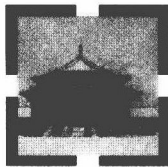
- 131 乾隆扩建盛京宫殿
- 135 筵宴庆贺祭礼成
- 138 清宁宫重行萨满家祭
- 142 乾隆时期盛京尊藏
- 148 《圣训》、《实录》和玉宝、玉册
- 151 文溯阁与《四库全书》
- 155 御制诗文颂旧宫

守护宫陵

- 165 盛京宫陵之守护管理
- 165 盛京宫殿的管理
- 169 盛京三陵的管理与守护
- 173 千疮百孔的末日宫殿
- 177 作为“世界遗产”的盛京遗珍

- 181 附录:盛京皇宫赋





一代王朝的胜迹，一段历史的辉煌

武 斌

2004年7月2日这一天，对于沈阳的城市发展史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就是在这一天，远在苏州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十八次世界遗产大会上，沈阳故宫和“盛京三陵”即新宾永陵、沈阳福陵、沈阳昭陵分别作为明清宫殿和明清陵寝的拓展项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沈阳城市的光荣与骄傲，是沈阳人民的荣耀与自豪。

沈阳故宫和“盛京三陵”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是中国记忆的一个组成部分。那巍巍的皇宫禁苑里，飞檐斗拱，雕梁画栋，金碧辉煌。雄伟的大政殿，八角重檐，金龙盘柱；高耸的凤凰楼，曾经有当年“晓日”的盛景；略带神秘气息的台上五宫，静谧的文溯阁藏书楼，都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艺术形式，完美地体现着满汉以及蒙藏等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与交流。在沈阳以东的远处，坐落着独具特色的清朝祖陵永陵，那里是满族崛起的地方，是一代王朝发迹的起点。如今，老祖先们默默地倾听着努尔哈赤挥师西进的序曲，山水形胜，启运山巍巍高耸，苏子河静静地流淌。在沈阳近郊，则坐落着两座威严壮观的帝王陵，楼阁高耸，殿堂峥嵘，松柏葱郁，规模壮丽，两位大清王朝的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安眠在密密的丛林之中。长长的昭陵御道，气势磅礴，大气庄严；福陵的一百零八磴，天柱隆崇，巍然在望；两陵深处，古木参天，松涛滚滚，体现着帝王的威严气度与豪迈情怀。

沈阳故宫和“盛京三陵”的建筑群，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具有独特的艺术和科学风格，包含着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不仅如此，它们所包含的历史价值，尤为重要。在这一草一木、一阶一梁中，都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遥想当年，从赫图阿拉那偏远的山寨开始，努尔哈赤父子率领八旗雄师，迅速崛起于辽东大地，金戈铁马，炮火硝烟，东征西伐，横扫千军，最后定都沈阳，创建了一个与中原帝国相抗衡的大清王朝；继而，他们挥师西进，定鼎中原，成为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就是在辽东大地活跃的短短的几十年



间，努尔哈赤和他的子孙们，上演了一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创造了一个弱小民族成就霸业的传奇。而在现存的沈阳故宫和“盛京三陵”中，作为一代王朝的胜迹，保存着那一段历史的辉煌故事，它们是那一段历史记忆的物质载体，是一个传奇的具象的表征。在这些历史记忆中，不仅仅有征伐与战争、惨烈与悲壮、英雄豪迈与气壮山河，不仅仅是铁与火的历史，而且，也有哀婉动人的爱情、美丽如画的传说、兄弟阋于墙的扼腕、风情独特的民俗。如今，人们走进当年曾经是森严壁垒的皇家禁苑，走进丛林掩映下的帝王陵园，回望那一代王朝远去的背影，凭吊、追思、惊叹，也浸染在历史的故事里面，感受曾经有过的光荣与梦想。

在沈阳城市发展的历史上，三百八十多年前始建盛京皇宫，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起点。沈阳是一片古老的土地，早在七千二百多年前，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并且以“新乐文化”著称于世。二千三百多年前，这里开始出现了城市的建的建制，一座侯城的遗址至今还深埋在市中心的地下。然而，那时候以及以后很久，沈阳都是作为一个边城小镇而存在，不起眼也不光辉。只有到了三百八十多年前，努尔哈赤把后金王朝的都城从辽阳迁到沈阳，才开始了沈阳作为一代帝王都城的历史。而正是从那时起，沈阳城市的地位日益凸现出来。经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的营建，形成了一个帝国都城的规模和建制。尔后，作为大清王朝的陪都，作为大清王朝的发祥地，受到了特别的保护和建设，逐渐发展为整个东北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三百八十多年后的今天，沈阳已经发展成为东北地区首屈一指的中心城市，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工业重镇，成为举世瞩目的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而今天沈阳的发展，实际上都是以盛京皇宫的始建为起点的。岁月沧桑，逝者如水，昔日的辉煌已经远去，而今天这个城市的人们正在创造着更大的辉煌。然而，今天的建设者们在回望历史的时候，总是能从先辈们开天辟地的事业中获得精神上的支撑和鼓励。所以，他们总是以沈阳故宫和“盛京三陵”为自豪，以一代王朝崛起的胜迹为自豪。

沈阳故宫和“盛京三陵”是历史留给今天的礼物，是经过漫长历史长河冲刷洗礼的珍宝。《盛京遗珍》讲述了这些珍宝的创建历程和岁月的沧桑，讲述了发生在这里的真实的故事。这些故事，或令人壮怀激烈，或令人浅吟低唱，或令人扼腕叹息，或令人心潮起伏，总之都是很感人、很有意味的故事。带着这些故事，再走进富丽堂皇的沈阳故宫，踏上福陵那一百零八磴排天台阶，走进青松翠柏掩映的昭陵，或来到启运山下听老人说古，都会有新的了解、感悟和感情。



迁都沈阳建造皇宫

迁都：努尔哈赤的重要决策

1625年农历三月初三，沈阳城南浑河，冰河初开，乍暖还寒，大地刚刚露出新绿，远处飘着袅袅炊烟。早春的辽沈平原一片宁静。忽然，一支庞大的军队从南奔驰而来。一时间，浑河岸边，军旗猎猎，车尘滚滚。这支庞杂而浩荡的大军在浑河岸边稍事停留，便跨过湍湍的激流，向沈阳城开进。

这一幅壮阔的历史画面，就是努尔哈赤领导的后金政权具有决定意义的迁都之举。努尔哈赤把后金的都城从辽阳迁至沈阳，不仅成就了日后大清王朝的辉煌历史，也注定了沈阳的兴盛发达。从那时起，沈阳不再是一个偏僻落后的边城小镇，而是一个王朝的都城，后金政权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从那时起，沈阳逐渐发展成为整个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为一个大都市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 努尔哈赤像



早在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率领的八旗劲旅攻占了沈阳城，但是他并没有把后金的都城迁到沈阳，而是迁到了明朝在辽东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中心——辽阳。他在辽阳修建了东京城和宫室，并将在赫图阿拉的祖塋也迁葬在东京城东北的阳鲁山。王公大臣们也纷纷大兴土木，修建王府官邸，准备在此安营扎寨。这些迹象表明后金似乎要将辽阳东京城作为永久性的都城了。

可是，在四年后的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努尔哈赤突然召集大臣会议，提出迁都沈阳的主张。这出人意料的提议，当即遭到诸王大臣的反对，说：



“迺者筑城东京，宫室既建，而民之庐舍尚未完缮，今复迁移，岁荒食匮，又兴大役，恐烦苦我国。”但努尔哈赤坚持己见，强调：沈阳“形胜之地，西征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可由清河路以进。且于浑河、苏克苏浒河之上流，伐木顺流下，以之治宫室、为薪，不可胜用也；时而出猎，山近兽多；河中水族亦可捕而取之。朕筹此熟矣，汝等宁不计及耶！”意思是“我早已考虑成熟，你们不要再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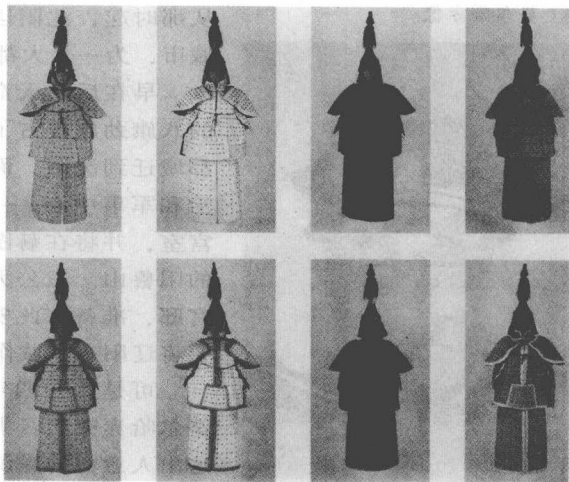
努尔哈赤的上述议论，概括了他决定迁都的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原因。皇太极继承汗位后，南征，消除毛文龙在辽南的骚扰；北征，解除了后顾之忧；西修都尔鼻城，渡辽河征明，充分发挥了以沈阳为都城的地理优势以及它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证明了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决策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但以当时辽阳、沈阳二城的自然情况相比，辽阳系辽东重镇，地域广袤，历史悠久，水陆交通便利，物产丰富，商业发达，人口众多倍于沈阳。那么，是否还有其他没有明说的原因，促使努尔哈赤在辽阳“居仅四载，席不暇暖”，就“亟谋它徙”，突然迁都沈阳，将宫室置于易屯兵拒守的沈阳城“镇边门”呢？对此史家众说纷纭。

综合多家的看法，努尔哈赤迁都沈阳的决策，更多的情况是当时后金所处的形势所迫。天命七年至十一年（1622—1626年）后金进入辽沈地区之后，促进了满族进一步接受汉族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使满族社会向封建化过渡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努尔哈赤制定的国策以“诛戮汉人，抚养满洲”为基本方针，对辽东汉人错误地采取了

◎ 八旗铠甲

了“抗拒者被戮，俘取者为奴”的民族高压政策。例如，天命六年（1621年）七月，镇江（今丹东）军民不堪努尔哈赤部众的欺压，起义反抗，活捉守城游击佟养正等。对此，努尔哈赤先后指派五千兵丁前去剿杀。天命八年（1623年），复州一万八千民人密谋逃往明军驻地，努尔哈赤闻讯，立即派大贝勒代善统兵三万，“尽杀男丁”，使辽南地区竟然出现了“赭地数百里”、“辽人不复耕”的惨景。努尔哈赤在征战中残





暴屠杀汉官汉民，同时将一部分俘获者作为奴隶，除分给满族贵族及官兵人等家内役使外，主要用来编成“拖克索”（满语，庄子），并强行驱赶辽东汉人以农奴的身份从事农业生产，使该地区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以致“时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者”，造成了“辽敝已极，辽人已空”的悲惨局面。

后金政权的暴政，激起辽东汉人的强烈反抗，屡屡发生汉人在食品、水井中投毒或袭杀后金官兵以及大批逃亡等事件。努尔哈赤遂下令不许后金官兵单独行动，店肆门前要竖立刻有店主姓名的木、石桩子，不准无居址的“行商”进行贸易活动等等，说明当时汉满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另外，后金立国初期，曾有一批汉官归降后金，并为后金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努尔哈赤晚年对归降的汉官也加以打击和排斥，引起这些归降汉官的不满。

从外部周边形势看，后金所处境况也极为不利：西有明朝强敌，北有蒙古，东为朝鲜，东南海上又有毛文龙等盘踞皮岛，使后金处在腹背受敌的包围之中。正是在这样的内外交困、矛盾尖锐的形势下，促使努尔哈赤当机立断，离开汉人聚居甚众的辽阳，迁至当时尚属偏僻小城的沈阳。

实际上，努尔哈赤的迁都从决策到实施都十分仓促。《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载：“庚午，上自东京启行，夜驻虎皮驿，辛未至沈阳。”《满洲实录》载：“于初三日出东京，向沈阳迁移，宿虎皮驿，初四日至沈阳。”关于迁都沈阳，《满文老档》的记载更为详细：“三月初三，汗向沈阳迁移，于辰刻从东京启行，在其父祖墓前供杭细绸，又在二衙门杀牛五头，烧了纸钱，遂去沈阳，于虎皮驿信宿。”可以想象，当时努尔哈赤于辽阳城匆匆告祭祖灵之后，便率领兄弟子侄妻儿老小和数十万官兵人等，仅用一天一夜的时间就赶到沈阳，其仓促混乱之情可想而知，足见当时局势十分严峻。

迁都沈阳与其说是努尔哈赤的高瞻远瞩，莫如说是由于当时的形势所迫。然而，此后的事实表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有利于稳定辽东，进而使沈阳城发展成为东北的政治、军事乃至经济文化中心，对后金国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为清军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础。

巍巍大政殿

在沈阳故宫院内，最重要也是最令人瞩目的建筑就是大政殿，现在它也是沈阳市最有代表性的标志性建筑。大政殿是清太祖努尔哈赤营建的重要宫殿，是清初举行重大典礼的地方，也是盛京皇宫内最庄严最神圣的地方。大政殿为清太宗皇太极举行重大典礼及重要政治活动的场所。1644年（顺治元年）皇帝福临也



在此登基即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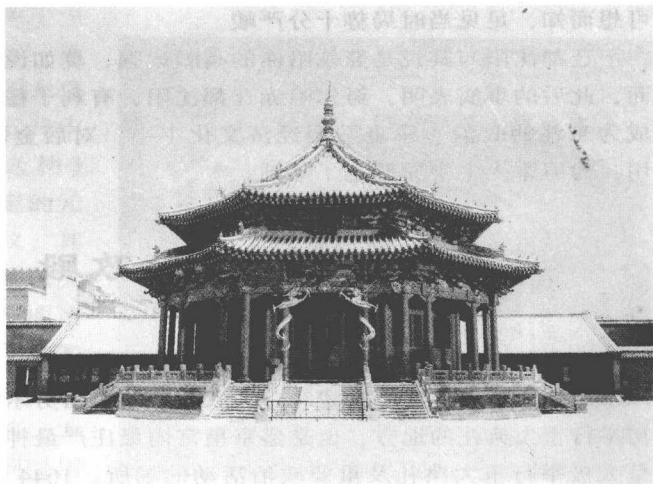
大政殿为八角重檐攒尖式，八面出廊，其下为须弥座台基。殿顶满铺黄琉璃瓦，镶绿剪边，正中相轮火焰珠顶，宝顶周围有八条铁链各与力士相连。殿前两明柱各有金龙盘柱，殿内为梵文天花和降龙藻井。殿内设有宝座、屏风及熏炉、香亭、鹤式烛台等。作为 17 世纪初的建筑杰作，大政殿汇聚了多民族的艺术特色，反映了满、蒙古、汉、藏民族以及佛教的建筑技术和建筑风格，形成了多民族建筑大融合的典型例证。它的组织方法、构图意念以及在造型、结构、技术、艺术上，既体现了历史的传承性，又具有满族崛起时代的特殊性，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中一个特殊的典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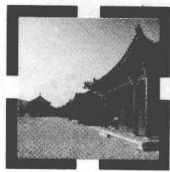
大政殿最早称为“大衙门”，清入关前，满文将“殿”均写成“衙门”，意为办事的衙署。而宫室为寝所居处，称“房子”或“家”，康熙初年依然如此。这种大衙门功能的建筑，并非迁都沈阳后才出现，而是自后金建国前就已存在于满族社会之中。大衙门的早期形态，是部落或氏族首领们议事的公共场所。这里既可以决定重大事件，又能对触犯法规的部族成员作出判决，与内地汉族的各级官署（衙门）的功能很相似，所以女真人就直接借用汉语中的“衙门”一词，作为本民族此类建筑物的称谓。

依照《满文老档》及《清太祖实录》的有关记载，天命十年三月后金迁都沈阳，是努尔哈赤突然宣布决定，而且立即付诸实施的，在此之前并无任何酝酿和准备。这就意味着沈阳城中并没有预先建造的宫殿，迁都至此一切皇家建筑都要从头做起。

明代的“沈阳中卫城”，城内除中卫衙门和一些寺观庙宇外都是店铺民居。努尔哈赤迁居此城后住在哪里，史书上并没有详细记载，只是天命十年五月初三日（迁沈后两个月）的《满文老档》中说：“汗家北塔的基石被周围家的人等盗取毁坏。上奏后，派遣众大臣搜存基石，并将被查获的人各打五十杖，这里的和尚也因看守不严，将为首的八

◎ 大政殿外景





◎ 大政殿榻扇门木雕

人囚禁，待众和尚修复后释放。”由此可得知，努尔哈赤住宅之北有一座佛塔。现代文物工作者根据从旧档案中发现的《盛京宫阙图》以及相关的考古资料，判断当年的汗王宫应在现沈阳故宫正北方向，北顺城路以南的位置。可惜现在已无遗迹可寻了。

比汗王宫复杂得多的大政殿是否也是在这期间建成的呢？对这座宫殿的兴建过程，史书中并无记载，因而

大政殿始建何时，成为沈阳故宫的一个历史之谜。历代史家们提出了三种不同的看法：一是清代《盛京通志》等官书中记载建于清太宗崇德二年（1637年）；二是认为建于清太宗天聪初年；三是认为建成于努尔哈赤去世之前，亦即认为大政殿是在努尔哈赤时期主持营造并开始使用的，这种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其主要依据是史书中的两条记载：

一是《满文老档》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初一日记，这天在八角殿杀四头牛、摆四十桌宴席，召集满、汉、蒙八旗总兵官以下，千总以上官员筵宴。这时距努尔哈赤去世（八月十一日）仅十天，既然能在八角殿筵宴，说明此殿在太祖生前即已建成。但是这条史料尚有可疑之处。因为其开头部分残缺不全，无法知道谁是这次筵宴的主持人，如果按照通常情况认为是努尔哈赤，则出现矛盾，因为这时他在本溪的温泉治病，不可能在沈阳主持宴会。如果认为是诸贝勒，又有些不近情理。汗王身患重病吉凶未卜，这里召集众官员大吃大喝，岂不是大逆不道？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这条史料所记本是辽阳时期的事情，因为残缺，被《老档》的整理者误编入天命十一年中，造成错乱。

另一条依据则要可靠得多，就是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初一日，后金诸贝勒大臣在“大殿”集合，新即位的汗王皇太极坐在殿中宝座上，接受臣属们的朝贺。《满文老档》天聪元年丁卯正月初一条载：“诸贝勒大臣及文武官员五更未集于大衙门（即大政殿）各按旗序排列。黎明，聪明汗率诸贝勒大臣诣堂子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而还。汗御衙门，升座毕，诸贝勒大臣各按旗序，行三跪九叩头礼……是年除夕元旦以太祖丧，撤乐停宴，汗仅受众人叩拜礼。”此殿即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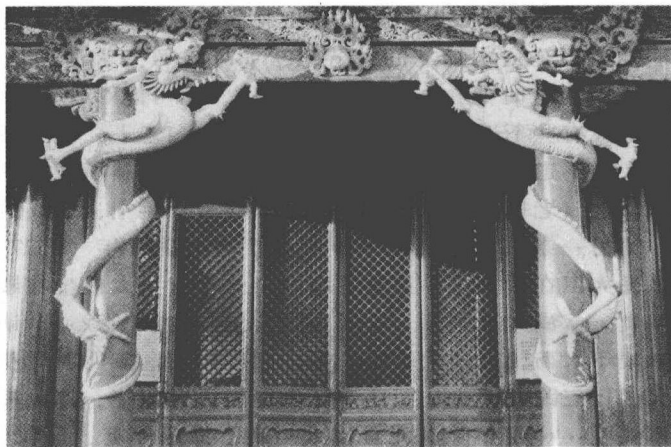
是大政殿。这时虽距努尔哈赤去世已四个多月，但在东北地区，农历十、十一、十二月气候严寒，无法进行建筑施工。那么，正月初一使用的这座大殿，只能建成于天命十年（1625年）九月之前，就是说努尔哈赤在世时已经基本竣工。这种推测合乎情理，因此，现在大多数人认为大政殿建成于1625年，即大政殿的主体部分应建成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至他去世前，即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至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

另外，皇太极即位后面临着国困民饥、战争频仍的严重局面，也无力大兴土木。皇太极一登上汗位（天聪元年，1627年）即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针，同时指出：“工筑之兴，有妨农务，从前因城郭边墙事关守御，故劳民力役，事非得已。朕深用悯念。今修葺已竣，嗣后有颓坏者止令修补，不复兴筑。”这一记载不仅为大政殿系努尔哈赤时期建成提供了佐证，也说明了皇太极孜孜求治，续修宫殿缓慢，以至十年之后，即国家局势已日趋稳定，改元称帝前才基本建成使用。

关于大政殿的命名，天聪十年，曾称大政殿为“笃恭殿”。在目前已发现的满文档案中，“大政殿”一称最早见于天聪八年（1634年）。据《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是年正月载：“二十八日，诸贝勒出大政殿。召集满、汉、蒙古诸大臣传谕曰：广鹿岛尚副将招抚长山、石城二岛，携民来归，非因我国衣食有余，盖承天眷佑，自来乞附也。故八贝勒家出粮四千石与之。凡积粮富足之家，藏之何为？可出粮与之。非无偿取之尔等，仍照数给以价值。”这条记载可以说明大政殿这一名称的出现，至少要早于崇德元年颁定的“笃恭殿”之名两年多。在崇德元年确定宫殿名

称之后，满文档案中也没有使用笃恭殿这一新名，而是继续沿用大政殿一称。在这年五月十四日的《满文老档》中，记录着新制定的元旦、万寿庆典礼仪，其中提到大殿时就是以大政殿称之。此后至顺治迁都前的各类满文档案中也大多如此。因此可以说，在清入关前，大政殿和笃恭殿是同时用

◎ 大政殿龙柱





于一座建筑的两个名称。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一殿两名的情况呢？根据现有材料分析，很可能是满语习惯称呼和汉文正式名称并行所致。崇德元年颁定各宫殿名称之时，大殿竣工已近十年，其间必然有一个早已为众人所接受的习惯名称，而且以书面形式通告于满文档案中，这就是“大殿”或“大政殿”，因为符合该殿的使用功能，很容易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印象。而“笃恭”一词，无论取意于汉语或藏语，都不太容易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况且当时对使用方面并没有严格的规定，所以只是以书面形式保留于汉文官修典籍之中。

在大政殿的东西两侧，依序排列着十座亭子，其中最靠近大政殿向前略为突出的两座亭子，为左右翼王亭。其余八亭则按八旗旗序呈燕翅状排开，合计十亭，人称“十王亭”或“八旗亭”。这些亭子与大政殿构成沈阳故宫东路一组院落。从建筑布局看，殿、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显得雄伟壮观，独具匠心，别开生面，和谐得体。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东巡盛京时曾赋五言律诗一首，赞颂了“大衙门”与“八旗亭”的宏伟建筑，诗曰：

一殿正中居，十亭左右分；
同心筹上下，合志立功勋。
辛苦缅相共，规模迥不群；
世臣胥效落，宗子更撝勤。

八旗制度与十王亭

大政殿和十王亭是满族八旗制度在建筑上的反映，是世界上少见的政治制度与建筑形式结合的典范。

在大政殿前一片南北长一九五米、东西宽八十米的空间地上，左右排列着十座大小形制完全相同的亭子式建筑，称“十王亭”或“八旗亭”。这一组亭子对称排列的院落建筑，看上去十分宽敞壮观。这里曾是清初八旗军政组织的指挥中心。凡有重大的军事行动，皆在大政殿颁发军令，调动八旗军队，在左、右翼王的率领下分赴各个战场。至尊的“圣汗”御用大殿与八旗王公大臣办事的“王亭”，同建在皇宫大内，形成“君臣合署办公”的局面。这种建筑形式反映了清初满族社会实行“军政合一”的八旗政治制度，在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史上可谓空前绝后，独树一帜。

十王亭由左右翼王亭和八旗王亭组成。努尔哈赤于1615年完善了八旗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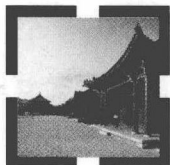


逐步确立了凡遇国家政治、军事大事，由八旗诸贝勒、大臣围绕在大汗周围分八处共商大计的政治体制。1622年，进一步确定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联合体形式。1625年，建造大政殿与十王亭，正是共治国政的民主政治思想在这座后金国“办事衙门”建筑上的反映。十王亭位于大政殿两侧八字形依次排列，其东侧五亭由北往南依次为左翼王亭、镶黄旗亭、正白旗亭、镶白旗亭、正蓝旗亭；西侧五亭依次为右翼王亭、正黄旗亭、正红旗亭、镶红旗亭、镶蓝旗亭。是清初八旗各主旗贝勒、大臣议政及处理政务之处。

八旗制度起源于牛录制。其前身是女真人建立的金朝（1115—1234年）实行的“猛安谋克制度”。女真人出兵或打猎，按族党屯寨进行。每人出一支箭，十人为一牛录，其中有一首领，叫“牛录额真”（汉语译为“佐领”）。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在牛录制的基础上建立了黄、红、白、蓝四旗，分别以黄旗、红旗、白旗、蓝旗为标志。四十三年（1615年）扩大为八旗。原四旗名称冠以“正”，另四旗名称冠以“镶”，即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新增的四旗的旗子，镶黄旗的旗子在黄色旗上镶红边，镶白旗的旗子在白色旗上镶红边，镶红旗的旗子在红色旗上镶白边，镶蓝旗的旗子则在蓝色旗上镶红边。每旗原则上应该包含二十五个牛录，每个牛录有三百

◎ 大政殿与十王亭





◎ 左翼王亭

人，共计七千五百人。但是实际上，每旗的牛录数量是不一样的，也是不固定的，随时可以按照皇帝个人的意愿而变更的。如努尔哈赤在位时期的八旗牛录数量大致是这样分布的：正黄旗四十五个牛录，镶蓝旗三十三个牛录，镶红旗二十六个牛录，正红旗二十五五个牛录，正白旗二十五五个牛录，正蓝旗二十一个牛录，镶黄旗二十个牛录，镶白旗十五个牛录。之后因为战事需要，努尔哈赤将八旗的编制重新做了分配。

八旗制度是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军事政治制度。八旗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以旗统人，以旗统兵”。它是“出则备战，入则务农”的兵民一体、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所有的满族人都被编入八旗，许多满族人也爱称自己是旗人。成年男子平时是老百姓，战时都是军人。八旗制组织严密，人员调动迅速，高度军事化。

牛录额真（“佐领”）既是生产的组织

者又是战斗的指挥者，其所属的每个成员都既是生产者又是战斗者。作为军事制度，有前锋、骁旗和护军之分：前锋披坚甲，持武器冲锋在前；骁旗披轻甲，从后冲击；护军是精兵，相机行事。八旗制度还是一种经济制度。各种行政经费按牛录为单位分摊。每个牛录派男丁十人和牛十头在空地上种粮食，收获的物品都要归公。八旗制度还是一种行政制度。各级大小官员除是生产的组织者、战斗指挥员外，还是行政官员，八旗充当了国家机构。总之，在八旗制度中，擅长骑马射箭的满族人被组织成一支强大的、特别能战斗的军队。八旗制度也成为中国清朝时期特有的一种行政机构和社会现象。

努尔哈赤于1615年完善了八旗制度，这一制度在后金国的发展中显示了它强大的威力。努尔哈赤立国之初凡遇军国大事，必于“殿之两侧搭八幄，八旗之诸贝勒、大臣于八处坐”，共商大计。而八旗王贝勒，都是由努尔哈赤的兄弟子侄充任。随着爱新觉罗氏家族中的汗位之争愈演愈烈，特别是大贝勒代善、二贝